

建築系退休教授吳讓治

追憶精采一生

採訪、撰文／陳宜炘
攝影／許智傑

吳讓治，一九五七年自台南工學院（今國立成功大學）建築系畢業，服完兵役後於一九五九年赴日本東京大學深造，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，是建築系首位取得博士學位之系友。在日本的建築師事務所實務工作一年後，吳讓治收到一封由建築系老師、當時的系主任王濟昌教授寄來的信，信裡表示母系將於隔年成立研究所，師資嚴重不足，希望邀請他返校幫助母系。思考一個月後決定回國，自1968年九月起於成大建築所開課，這一教，就是超過三十年。

日本小學校風嚴格 大戰後返台探親

時間拉回一九三五年，父親為台灣嘉義人、母親為日本東京人的吳讓治於東京呱呱墜地。原為牙科醫生的父親，在他三、四歲時重考醫學院，後來轉科成為外科醫生。吳讓治進入石川縣金澤市師範附小就讀時，父親還是醫學系的最後一年級生，因此父子倆早上總是一起出門上學。

「我記得當時進小學校還要口試，老師先

問你的名字，然後要你到窗邊拿一個蘋果回來交還給老師，他看你的動作跟交代的事情是否辦好，就這麼簡單的事情，好像就過關了！」

吳讓治回憶，金澤師範附小的冬季男生制服是長袖短褲（當時沒有長褲），但教室窗戶永遠是開的，到了冬天，短褲及上衣的口袋又都被縫起來，無法把手插在口袋裡取暖，手再凍都得忍耐，「所以立正時我們手都要握拳，不然會凍僵。」。在如此嚴格管理的校風之下唸了一年的書，由於醫學院畢業的父親被派到日本北部較偏遠地區服務，準備升上小學二年級的吳讓治也跟著轉學，「那裡的冬天溫度會降到零下28度，真想不起來當時是怎麼過來的！」。

三年級時，他又換了另一間學校就讀。

提到日本小學的教學特色，吳讓治說，日本小學認為每件事情的基礎都很重要，例如書法課，老師會先教小學生寫書法的坐姿、大小筆怎麼收、硯台如何放墨。待學生學會了以後，他們才要學生拿筆（但不沾墨），老師以大筆在白板上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教，從最簡單的「一」、「人」，最難只教到「口」字，這

主編的話

校長的話

大事記

合力寫校史

觀點

發現成大

夢想成大

校園記事

澄
清
湖
成
大
校

些東西就可以教一整個學期。「所以我們拿筷子、拿筆，沒有一個人是奇怪的拿法，他們還滿重視這個東西的。」他表示，日本小學老師對學生的要求不多，但要求正確的姿勢及操作方法，例如勞作課最先學的也是怎麼磨工作刀。「所以到現在為止，我家的菜刀都是我在磨。」吳讓治笑著說。

小學四年級，1945年大戰結束，日本許多大都會地區都因盟軍轟炸而成為廢墟，住在較偏遠地區的吳家雖僥倖逃過空襲，但仍有糧食問題要面對。當時百姓家中所有的金屬，都因戰時的金屬回收令而捐出，用來製作大量武器，因此家家戶戶都只剩下一個鍋子，且戰後日本糧食缺乏，連鹽巴都沒有，很多人只能以海水做菜增加鹹味，因此孩子們都營養不良、免疫力極低，生疹子、流綠色鼻涕的比比皆是。

遷至蘇北南通 不懂方言躲倉庫逃學

戰事結束幾個月後，父親帶著全家回台灣探親，但回到台灣後，出入境已經不像過去那

麼自由，因此吳家只得在台灣定居下來。當時台灣社會情勢動盪，工作難尋，職業原為醫生的父親，也只能暫時棲身於嘉義中學，擔任生理衛生課的教師，然而嘉義中學卻遲遲發不出薪水。後來，父親應徵到高雄陸軍醫院擔任軍醫，帶著全家人遷至高雄，卻遇上血淋淋的二二八事件。





「邁向七十一成大建築系學生暨系友作品特展」暨系列論壇活動邀請退休教授暨系友吳讓治擔任開幕演講者，主講「成大建築還可為台灣作什麼」。照片提供／成大建築系友會

沒多久，高雄陸軍醫院決定遷至大陸，吳家人也跟著部隊從台灣到福州、從福州再到上海，最後又到蘇北的南通。搬到南通後，吳讓治進入營區隔壁的省立南通中學就讀國中一年級。「同學的年齡很不一致，我是最小的，有人穿長袍馬褂，也有十七、八歲留鬍子的，可

是他們講的都是方言，連國文課上的都是方言。」母語為日語的吳讓治，之前在台灣也只住了將近一年的時間，閩南語和國語都只學了一點點，到了南通，又要面對只說方言的同學，壓力可想而知。

「我在學校幾乎聽不懂，英文的單字可以，數學的計算題也可以，但是應用題就已經看不懂题目的意思了。」上起課來已經非常吃力，考試更是難上加難，年幼的吳讓治，除了語言不通的壓力，還要承受來自有些老師的訕笑。「老師就拿著我的卷子說：『有人就只寫這麼一點點，他就像一個白癡。』！」吳讓治說，由於當時父母的工作、生活都很忙碌，無暇顧及孩子，所以有一段時間，他每天都假裝自己正常去學校上課，事實上卻是躲在學校附近的倉庫，從第一節的鐘聲數到第四節，再回家吃午餐，就這樣過了好幾個月，學校也不通知家長。「反正去學校聽不懂也不是很愉快啊！」雖然不太願意去學校上課，但每次只要是勞作課，吳讓治必定出現。他回憶，當時老師曾要他們在竹子表面刻上葡萄葉及葡萄根，為了這個作品，他在家刻了整整一個月。

當時南通還沒有自來水，所以每天早上他都得到河邊挑水，除此之外還得到街上買熱開水，晚上則要幫隔壁鄰居上街買高粱酒，「冬天很冷啊！所以走的時候，空瓶裡還有一兩滴酒嘛，喝下去以後喉嚨就好熱好熱！還有，南通的大餅裡面有蘿蔔絲，真的很好吃呢！」想起童年趣事，吳讓治不禁笑起來。

千辛萬苦返回台灣 幸運插班回歸校園

在南通住了一年多，八路軍逐漸佔領各地，晚上槍聲大作，白天則四處可見血淋淋的傷兵。眼見部隊即將解散，吳讓治的父親先跟醫院請了長假，接著收拾家當帶著全家回到上海，託了親戚購買船票回台灣，親戚卻遇上扒手把錢全部扒走，於是吳家只得變賣金飾，勉強買到輪船的站票，就這樣在甲板上搖搖晃晃地過了兩三天後，總算抵達基隆。

回到基隆以後，身無分文的吳家人坐上火車頭後接的煤炭的車上，到了台北，寄居在吳讓治的大姑家中。半年後，父親才總算找到工作，在竹山糖廠擔任醫師，之後接著又輾轉於斗六糖廠、虎尾糖廠工作。「有時候我來不及轉學，因為搬家搬得太快了，所以就住在父親同事的家裡。」住在竹山的這段期間，父親為吳讓治報名了國中二年級的插班考試，然而，從小學四年級到國中二年級，幾乎沒有念過正規課程的吳讓治，根本不知從何準備起。第一天考的是英文跟數學，由於父親是醫生，英文能力很強，平時也常會教他英文，於是吳讓治不到半小時就交卷，還考了一百分，轟動全校；數學科的計算題對他來說不成問題，只有應用題有幾個字看不懂，舉手詢問老師題意後，日治時期就開始教書的監考老師隨即為他以日文翻譯題目，因此數學科也考出了很好的成績。「老師看完就說，明天不用來考試了，你可以插班！」吳讓治笑著說，第二天考的國

文跟公民，正是他最不會的、「漢字一堆」的科目，自己運氣好不用考這兩科，終於能恢復正常學校生活。

儘管順利插班，吳讓治上課還是有些聽不懂，於是下課後由各科老師輪流輔導，每天放學後留下來一個小時，一個學期後，他的課業就順利跟上同學進度，畢業時更是拿了一堆獎品、獎狀回家。「但我後來發現班上其他同學都比我大一歲，年齡算錯了、我跳級了，所以一直到大學，我都比別人小一歲。這樣亂七八糟的學歷過程，我小學沒有畢業證書，國中也沒有畢業證書。因為沒有正規學籍，教育部只給我同等學力證明，再用這張證書考高中，所以我的第一張畢業證書是高中。」他回憶。

不願學醫 父親建議攻讀建築

考高中時，吳家由斗六搬到糖廠，嘉義中學出身的父親要他就讀嘉義中學，於是選擇了參與嘉義中學的考試。放榜那天，家裡正好要從斗六搬到虎尾，因此他沒辦法抽身去看榜單，第二天到了嘉義，才發現榜單因為前一天下雨，半張都已模糊難辨，還好他的名字就在那一半未濕的紙上，这才知道自己順利考上嘉義中學。

順利從高中畢業後，接著就得面臨大學的選擇，當年還沒有大學聯考，全台灣只有四間大學：台灣大學、台南工學院、台中農學院及師大。從牙醫轉為外科醫生的吳父較為強勢，對醫生也有某種執著，期待兒子能克紹其裘，

了解父親強烈期許的吳讓治，在高中以前都認為自己未來會成為一名醫生。

然而，高中時卻有幾件事影響了他的選擇。高二時，父親帶了一個骷髏頭回家，放在吳讓治的書桌上，告訴他這是對醫學生非常珍貴的參考資料，若他能順利考上醫學院，就將它送給他。打從心底覺得骷髏頭很醜的他，隨便找了藉口逃出去，不太願意留下來面對桌上的骷髏頭，硬是在外頭遊盪至深夜才回家，還好回家後父親已經將它收起來，說考取醫學院後才能送他。這件事後，吳讓治開始尋找不願成為醫生的正當理由，例如「醫生都跟不健康的病人在一起」等等，希望父親能打消念頭。後來有次算命，算命師表示他「一生桃花、會娶三個太太」，更強調這就是他的命，無法破解，從小就熟悉醫院生態的吳讓治，對於已婚醫生及年輕護士間的緋聞糾紛也時有所聞，於是下定決心不要進入職員多為女性的醫院工作。

不當醫生，還有什麼選擇？原本對理學院很感興趣的他，希望能進入化學或物理科系就讀，但父親卻直接將大學入學考試的報名表拿去填寫，第一個先填了台大醫學院，接著考量吳讓治的各科成績都很平均，甚至連體育、音樂、繪畫都跟其他學科成績差不多，覺得也許可以朝建築發展，於是第二個就填了台南工學院建築系，其他則開放兒子自由填寫。吳讓治心想，至少蓋房子是建設性的事情，工人（相對於醫院病人）健康，蓋出來的建築又很漂亮，

覺得也無不可，加上不想花太多父母的錢在報名費上，只填了兩間學校、兩個系的報名表就這樣交出去了。

建築系讀出興趣 為請假考留學考

當年先舉行考試的是台南工學院，考物理時，急性子的吳讓治，寫不到半小時就交卷，完全沒有檢查答案，結果人還沒離開教室，就知道自己剛剛不小心錯答了一題。當時每科考試都只有四題或五題，錯一題，丟的就是二十或二十五分。心想考不上的他，原本已經打算要全力以赴考取台大醫學院，未料赴考前台南工學院就已放榜，「居然考上了！這麼容易就考上的話，那醫學院不小心也會考上！」於是在考台大醫學院時，吳讓治處心積慮、費盡心機，這題不寫、那題答錯，為的就是讓台大醫學院成為第二志願，結果差了十二分，沒有考上。

進入建築系的第二年，父親又給了他報名費，要他去考醫學院。「我根本沒去考，就自己吃掉了，然後跟父親說：『好難喔！』。」吳讓治的眼神閃過一絲促狹。然而，考進建築系以後，吳讓治發現，建築系跟想像中不太一樣，要磨脾氣，製圖又很花時間，急性子的他開始和同學一起討論轉系問題，但當時幾位「很有魅力」的助教學姐，告訴他們「慢慢磨練，二、三年級以後就會慢慢有興趣」，與同學商量過後，吳讓治決定留在建築系。升上三年級後，他漸漸對建築產生興趣，但對未來仍是十分不安、沒什麼把握，於是四年級畢業前

夕，他詢問系主任是否能留級，得知唯有上下學期的學分沒拿到才能留級，因此決定直接畢業、入伍當兵。

「當時當兵要兩年，也蠻嚴格的，只有高考或教育部留學考試可以請假。」為了「好玩」，吳讓治決定去考教育部留學考試，當時台灣仍在戒嚴時期，沒有大學的入學許可，就不能出國留學，於是父親為他申請了早稻田大學的入學許可，而他也順利通過考試。到了東京後，吳讓治才發現，私立的早稻田大學比起國立的東京大學，學費整整高了十倍，於是他直接到東京大學建築所找所長，詢問能否進入該研究所就讀。所長表示，所裡目前有來自土耳其、印度、加拿大、匈牙利的學生，但還沒有台灣學生，加上吳讓治的日文還可以，於是找了幾個教授面試後，就同意讓他進入研究所當旁聽生，半年以後再正式入學。

東大求學影響一生 母系邀請返校教書

吳讓治表示，自己進了東京大學以後，見識到一所大學應有的水準，不管再難的問題都問不倒教授，而教授們開起學術研討會來，更展現了充分的學識。「所以我雖然一開始壓力很大，但真的覺得唸書好快樂，是我人生第一次那麼用功！」他形容，自己在東大待了七年半，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，後半段的求學時期，唸起書來就像是「增加肌肉」，通體舒暢，非常快活。這段在東大求學的日子，影響

了他的一生。

當時許多人畢業後都至美國發展，吳讓治則有機會到加拿大。就在博士論文寫完、準備拿到學位時，當時的成大建築系系主任王濟昌教授，寫信邀請他至即將增設的母系建築所開課。吳讓治心想，自己在這裡已經享受到讀書的快樂，台灣學生卻沒辦法體會到這種感覺，希望能將這種快樂帶回台灣、傳給年輕一代，於是一個月內，他就下定決心返回台灣。「那時候血氣方剛，覺得自己的國家要自己爭一口氣，哪裡好就往哪邊走，有點……不夠男子氣概。」他解釋。

建築師沒尊嚴 專心從事建築教育

是否曾經夢想過成為一位建築師？吳讓治坦言，生產東西確實是一種樂趣，所以學建築的人通常很想做設計，因為設計是最華麗、最瀟灑的一條路，當時也曾經想過以培養下一代為主要工作，並同時兼顧設計。但他隨即發現，在台灣當建築師非常辛苦，因為台灣人是一個「嘴巴發達、耳朵眼睛都不好」的民族，辯才無礙、味覺也很靈敏，但聽不進去別人的話，眼睛也看不到環境的髒亂，不夠乾淨整潔。台灣建築業的業主也十分霸道，總是告訴建築師怎麼設計、怎麼做，建築師沒有什麼發揮的空間，「就像酒家女一樣，客人要你唱什麼歌就得唱什麼歌，一點尊嚴也沒有。」吳讓治口氣凝重。此外，工地施工粗糙，建築師也阻止不了偷工減料，不像日本施工非常細緻，

在台灣若建築師開口挑剔工程品質，就會被認為吹毛求疵、囉哩囉嗦；設計費不太高，卻又要求在超短時限內完成，國外一般耗時一、兩年的設計，在台灣兩個月、甚至兩個禮拜內就得完成。「這樣的工作環境做不出好東西來，我也不喜歡在這邊耗。」因此不到一年，吳讓治就斷了建築設計的路，專心從事教育工作。

當時吳讓治心想，自己的工作就是好好培養下一代、培育好的人才，如果一年培養跟自己差不多的五個學生的話，十年就五十個，教三十年的話一百五十個，這些人畢業之後若再繼續成長，不到二十年臺灣的建築界就不一樣了。「其實事情沒有這麼單純啦！」想起自己當時的天真單純，他也不禁微微一笑。

吳讓治說，早期成大很多建築物都是由行政主管裁量後蓋的，但民國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這段時期，他曾從旁給予許多意見，雖然蓋出來的房子還不夠理想，但至少還維持一定的水準。另外，由於當時留學後返回台灣的人不多，尤其建築界有博士學位的人更少，許多雜事都找上吳讓治，常常得到台北開會，消耗許多時間及體力。「年輕時覺得還好，但慢慢覺得這個社會推也推不動、拉也拉不動，很難做事，如果你不做事只泡在那裡的話，就像泡溫泉一樣舒服得很，但真的想做事的話就非常累。」回國十年以後，吳讓治認為，拚命拚了十年，還是有很多事情無法改善，又不忍心離開年輕學子。「所以我想，自己就放棄做明星的路，徹底做肥料就好！」為此，吳讓治再也

不接收委託研究，辭掉所有委員會的委員，關在研究室跟學生討論研究、寫論文。

籌備創建成大醫院 「今生未交白卷」

他回憶，返回母系教書時，系上一篇研究報告都沒有，「年輕人沒有看過研究論文是什麼東西要怎麼寫？連題目都不太會選！」他說，開始教書的前五年，就像在教幼稚園一樣，從訂論文題目到寫完論文整個過程，他幾乎都得全程參與。「當時的學生現在已經六十幾歲，其中好幾個人曾跟我說：『我人生當中最快樂是那幾年研究所時間，好像自己一直在成長的那種感覺』，我覺得很高興，這一生算值得了。」吳讓治笑著說。

下定決心當「肥料」以後，他的心情也比較平靜下來，完全專注於教學研究上。四十五歲那年，適逢母校積極籌備創建成大醫院，吳讓治獲邀加入籌備委員會（籌備委員其餘四人分別為：校長夏漢民、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教授藍忠孚、省立桃園醫院院長李俊仁、台南醫院院長陳金樹），協助硬體方面的規畫及督導。吳讓治回憶，校長夏漢民當時對他十分信賴，而他也認為，若能在臺灣南部設立一間能平衡醫學教育南北差距的醫學中心，無論是對臺灣南部或全台灣都有好處，因此全心投入成大醫院的規畫。

同個時期，台灣大學也在蓋醫院，但晚一年動工的成大醫院，卻比台大醫院提早一年完工，更只花了約一半的預算，「品質也不會輸

台大醫院！」吳讓治強調。但他也坦言，若重新再來一次，應該還能減少三分之一左右的經費，或規劃得更為完善。「但這個計畫至少讓我覺得，這一生不是只是動嘴巴、交白卷，還留下了一些實體的建設。」他表示，自己在學校教書教了三十二年，想做的事情卻做不到三成，但至少完成了成大醫院，多少替鄉土作了一項正面的工作。「本來應該做得更多，但是我偷懶又不夠認真。」他半開玩笑地說。

專攻房屋工業化 全力推動教授專業化

提到自己的研究專長領域，吳讓治說，自己專攻建築構造，簡單來說就是研究如何蓋房子，因此包含如何隔熱、隔音、防水都在他的研究範圍內。在東京大學攻讀建築碩士學位時，吳讓治的論文主題是「房屋工業化」，研究如何將房屋的各個部分先在工廠做好後在工地組裝，而非把各個圖面發給不同營造廠，而做出品質不盡相同的成品，如此一來將可大量提升速度並控制品質，而這種標準化的設計及作法，也能解決戰後百廢待興、建築人才卻大量不足的問題。碩士時研究房屋工業化，攻讀博士時，吳讓治則專攻建築的耐衝擊性，探討建築物的耐力及強度，「強度太高是浪費，強度不夠也危險。」他表示，要生產標準設計，就必須了解每個環節怎麼設計、怎麼施工等，摸索生產合理化之方法論。

然而，返回台灣後，他發現，台灣社會的條件並不適合房屋工業化，當時美國、日本工

資往往高過建築費的一半，因此品質平均、造價也能壓得較低；然而台灣工資僅佔建築費的百分之二十以下，工業化後造價會更貴，且相對做的東西也較不精緻，不同的板做好後，預製本身沒有問題，但接起來以後可能就會「漏水漏得像瀑布一樣」，因此不適合工業化，但「生產合理化」的思路仍然是可被接受的。因此，吳讓治僅開了一門相關的課啟蒙學生，而他主要的工作則集中在課程的編排及教授們的研究專業化。

曾兩度擔任建築系主任及建築所所長的吳讓治表示，過去的建築系，一名教授開三、四門課，什麼課都可以開，且三、四個教授共用一間研究室，因此研究室對教授而言除了放置及拿取課本外，幾乎沒有其他作用。對此，吳讓治堅持，每個教授都應該有自己的專長，力學的就教力學、歷史的就教歷史，「以醫學院舉例，如果一個教授基礎醫學也要教，臨床醫學也要教，外科跟內科全部教，這樣不太好，應該內科就教內科、外科就教外科。」此外，他也要求教授們應根據自己的專長，以研究著作及學術論文來升等，而非年紀到了就升上去。花了二十幾年，吳讓治總算漸漸地改變了系上的風氣，然而他坦言，現在的建築系「專業化」和「以研究成果為升等依據」是做到了，但是現在許多教授只關心自己的專業，連隔壁研究室做什麼都不知道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他開了一門「建築計畫」的課，教導學生統合的概念。「醫學院也有類似的毛病，分

得太細，聽說病人背部痛，有的醫生只看他脊椎幾節，上下不看，這未免也分得太細了。」他強調，建築也是同樣道理，除了深究自己的專長，也要對相關事物有廣泛的了解及涉獵，廣與深要兼備。「各做各的，隔閡太多了，合作、融合的力量就折扣了！」他表示。

建築教育與建築環境息息相關

至於建築教育，吳讓治認為，教育有很多種，如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、研究所，還有家庭教育、社會教育、實務教育等，「我們負責的是大學這一段，我認為，大學絕不可淪為單純的職業教育，大學教育的重心應該放在『心』和『知』雙方面的自立，以培養下一代的社會良知。」。

「活了這麼久以後，我慢慢覺得，學習的最高境界是自修，思考方式的最高方式是自問自答。真正的人才，不需要老師。但是普通的人，有好的老師、有好的環境，對他的成長絕對有好處。所以，老師和資訊的品質很重要；再過來就是環境的品質很重要。從這樣的觀點來看，台灣建築的教育問題跟台灣建築環境的問題，有很大的關係。」他舉例，住宅是生活的容器，有什麼樣的生活，就要住在什麼樣的住宅，因此住宅設計應該多了解居住者的生活內容及需求，一間好住宅，對居住者生活的安全、舒適、思考、品德應該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。然而，對吳讓治而言，目前台灣許多豪宅，已經不再是住宅，而只是造價以億計算的

宮殿罷了。「據說那些最高檔的台北住宅—這是最極端的例子，幾乎沒有人住，只有傭人在住，傭人房間有十幾坪，老闆都沒有住，所以整棟豪華大樓中就只有幾個傭人在裡面。它是保值或財產、名分，不是生活的地方。」，他說，這種皇宮般的豪宅，大都設有按摩浴缸，若天天使用、妥善保養還好，若鮮少使用，浴缸內管線會留下髒垢，產生臭味，清洗起來又非常麻煩，像這些社會上對建築不合理的設計要求，與所謂「建築學」的立場並不太吻合，「該怎麼教學生」就成了很痛苦的一件事。

專為國民設計的國宅呢？吳讓治說，要蓋國宅，就應該先了解一般民眾的家庭規模、生活起居習慣，以及他們的購買能力，政府更應推出配套的貸款方式，讓需要房子的人能買到房子；此外，國宅內普遍設有浴缸，但根據他的調查，國宅的居住者使用浴缸的人不到百分之十。「那浴缸要做什麼用？為了防火災的時候當水槽用。這個就是想法、做法跟實際都接不上，這樣的例子真的很多。」他輕嘆。

與國際接軌 勿忽略自主思考

另外，在台灣混凝土的構造通常可以用到四、五十年，水管則埋在混凝土裡，然而因台灣石灰質多，水管約十年就會生鏽或是被石灰阻塞，因此在混凝土耐用期限之前，藏在裡面的水管就得更換或維修個兩三次。國外一般的做法是將混凝土及管道系統分開，但台灣卻是將水管全部埋在樓板地下或柱樑裡面，若遇上

地震管線容易變形，變形的若是接合處，即很有可能就產生漏水，加上水往低處任意流竄的特性，導致住宅內漏水處可能並不是真正有問題的地方，抓漏因而變得十分困難，而工人四處敲打尋找漏水處，也會破壞房子本身的建築。「所以我們要推廣像國外一樣『明管』的作法，將結構體跟管道系統分開，看得見哪裡漏水，修那個地方就好了。但是台灣不肯，覺得全部埋進去比較……隨便又方便。施工的人方便，但是對住的人跟修理的人而言都是不方便的。」吳讓治說，直到現在為止台灣還是幾乎沒有採取明管的住宅。

「所以回到建築教育的問題，在理論上該怎麼教、就怎麼教，但在台灣，不能跟外國一樣的教法，因為我教的是為了改進、提升台灣的房子，所以看到不合理的問題或危險，就針對這個、強調這個，慢慢改正過來，走一步算一步，重點是怎麼針對目前現實的生活踏實地去改良、糾正或提升品質，這種態度，就是心態與知識雙方面都是很重要的。」吳讓治語重心長地表示，台灣是個小島，應該用心地去看別人在做什麼，所以敏察國際動態是重要的，但是與國際接軌最重要的是為了要保護、提升自己，不一定是跟著別人走。他強調，思考、學一技之長，都是為了改善問題、提升自己，所以確實地面對自己，認識自己及四周環境的優點跟缺點，優點保留、缺點要改進，這就是最基本的態度跟重點。

擁有純粹的心 全心投入最重要

教書三十餘載，有沒有遇過令人印象深刻的學生？吳讓治說，一開始教書的時候，當然還是會注意到聰明、反應快的學生，但經年累月下來，他發現，有一顆純粹、體諒別人和關心社會的心，以勇氣與誠實面對自我與環境，關心下一代的未來與環境，有所為、有所不為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他舉例，有的學生在九二一大地震後進駐埔里災區，直到現在都還留在那邊為當地居民服務，也有些人在事業成功後，為了公共利益或培育後進付出許多心力，「這樣的人，我就覺得能有機會跟他們相遇是一個很大的快樂。」想到這些學生，吳讓治的嘴角不禁浮現一抹微笑。

對於建築系的學生，吳讓治建議，平時應該多看、多想、多畫，就像打籃球一樣，看誰球打得好，就去學他，同時也要反省自己為什麼打得不夠好。「『投入』也很重要，因為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；問自己到底愛不愛建築，因為一個不熱愛自己工作的人，不可能會成功；拼命學習、模仿，總有一天你一定會超越你的學習對象；常常自問自答、找回自己、認識自己、了解別人，做一個善解人意的人；培養對空間的感受力、要有自己的美學……」退休已十餘年、幾近耄耋之年的吳讓治，談起與建築教育相關的話題，仍是精神奕奕，雙眼散發出奇異的光采……